

《 接 1 版

■ 记者 王红英 报道

4 月 15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我国一季度 GDP 成绩单：2013 年第一季度 GDP 未能如期实现“保 8”，年率增幅放缓至 7.7%。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不及预期，暗示我国经济不再高速增长，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复苏乏力。

调整消费政策 拉动经济发展

以前我们的经济增长，投资是主要的动力。但是随着各级政府加大结构调整、加快产业升级，现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不断地提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GDP 增长 77%中，有 43 个百分点是由最终消费贡献的，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是 55.5%；资本形成总额对 GDP 的贡献率 30.3%，拉动 GDP 增长 23 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是 14.2%，拉动了 11 个百分点。

所以，从结构来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而且在内需中投资和消费贡献的比例在发生积极的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提升。当然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模式的转换不是很快能够完成的，需要一个继续创新的过程，所以政府强调要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不断地调整我们的经济发展结构，进一步地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2013 年，我国扩大内需的难点

经济发展的 方式转变与转型

■ 胡健/文

中国正处在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中国长期形成的低劳动力成本、高资源能源消耗的发展战略已经难以为继。拉动 GDP 增长 23 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是 14.2%,拉动了 11 个百分点。

做外贸生意的老张夹着烟,把 LV 钱包放在桌上,紧闭双眼慢慢吐出 3 个字:太难了。

老张说,他一度想变卖厂子,然后回河北老家种地,“2007 年之前都顺风顺水,国外市场非常好,我压了许多钢材准备卖个好价钱,但突然间就无人问津”。

幸好,老张只是变卖了房子和车子,留下了工厂没有变卖,苦苦支撑两年之后,老张也开始变通地做些进口贸易,而且眼睛不光盯着欧洲和美国市场,现在他的客户里更多地出现了“桑托斯”、“费尔南德”这样的南美国家常见人名。

“这些地方的人要的东西多,而且没有欧美客户那么多麻烦。”老张笑着说,做生意最大的“不变”,就是要善于变化。

对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讲,变化一词恐怕难以负载宏观经济战略决策的调整,而转型则恰如其分。

灾变的提示

2008 年,席卷美国、影响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喷薄而发,中国企业亦难独善其身。

廉价的服装、鞋帽和小五金成为“中国制造”,乃至中国经济的代名词,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美元疲软和人民币升值,中国企业价格优势不再,出口受到抑制。于是出现了老张所说的那句“太难了”。

经济数据证实了老张的感受。中国 2008 年四季度 GDP 增幅快速回落至 6.8%,拖累全年经济增速下跌至 9%,是 2002 年以来的最差表现。

金融危机是对中国经济一次由表及里的体检,已经使人看到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加入 WTO 之后,中国经济加速之快令世界瞩目,GDP 增速从 2001 年的 8.3%提高至 2007 年的 13%,增量部分外需贡献了 63.9%,接近三分之二。

但这是 WTO 红利附加全球经济高潮的结果,一旦外部环境不佳,高位的经济增速就难以持续,这从金融危机之后的表现也可明显地看出。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

和重点在消费,潜力也在消费。根据研究,预计全年消费增速将继续回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将保持在 13%左右。虽然增速比前几年偏低,但社会消费更接近无水分增长,消费结构优化,增长模式更加健康。

因此,要根据扩大消费战略的实施步骤,从提高消费能力、稳定消费预期、增强消费意愿、改善消费环境等几个方面入手,通过消费政策的推动,引导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使消费沿着可持续的增长路径,形成强烈的内生增长动力,提升居民消费规模,促进消费总量不断增长,消费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方式出现实质性转变。

众所周知,当前,住房、汽车是消费的热点,而有些城市正在限制汽车购买。这和扩大内需相关政策有冲突。可通过适当限制使用,提高拥有率,降低使用率,把限制购买变成放开购买,为轿车进入家庭、轿车的生产销售进入良性循环提供条件。像东京、纽约、伦敦这样的大城市所有家庭都有轿车,但是使用率比较低,上下班还是乘坐公共交通,节假日或者急需用车时才使用。

另外,要降低奢侈品的进口关税。现在中国人在外国的采购全世界第一,中国的游客在全世界购物量平均一个人达到三四千美元,而日本人海外出行购物是两千多美元。中国购买的奢侈品占欧洲市场奢侈品的 46%,占北美奢侈品市场的 25%。这么大的购买量,为什么不能留在国内?适当降低进口关税,使得国内购买价格与国外价格持平甚至更便宜,中国消费者海外旅游也不会大包小包地往国内带了,拉动国内经济不是更好吗?

此外,环保也是当前的热门话题,加大环保投入同样可以拉动经济。近日,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建议,要以降低 PM2.5 为杠杆撬动产

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目前,环保部正抓紧制定《京津冀地区联合治理大气污染行动计划》,一共十条,措施非常有力。这十条措施出台后可能对环保投入形成一个热潮,现在关键是要建立一个生态体制。

所谓生态体制,就是通过对环境生态的投入,同样可以产生 GDP,产生利润,增加就业。也就是说,要颁布一个强制性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大家都来执行,达不到此排放标准就关门。这样,所有企业把各自的污染物回收设备都安装上,而且一天 24 小时开起来,这样就形成了环保产业的庞大市场。利用这个市场机制,拉动环保产业的发展,使环保投入形成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

各级政府要把提供清洁的空气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现在一般商品都供过于求了,生产资料供过于求了,但是公共产品包括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还是短缺的。这个短缺就要靠政府来解决,形成这些公共产品的一个市场,引导资金投入。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认为,影响消费增速的环节有很多,但收入历来是与消费直接挂钩的要素之一。这两年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培育和关注度还不够,促进消费的关键仍得从深层次的体制方面进行完善,包括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等。

调整经济结构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在 6 月进行的中美元首会晤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一季度 G D P 7.7 % 的增速有利于调整中国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7.7%的增速并不低,而且有利

于调结构、转方式。”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也分析表示,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性问题,总体政策仍以稳为主,问题将会更倾向于通过定向制导的结构政策去解决。

当前,我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特别是 2008 年以来为应对次贷危机的冲击而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导致很多产业盲目扩张,加剧了产能过剩。其后果有二:一是工业产值增长放缓,自 2012 年以来,除个别月份外,一直维持在位数增长;二是 PPI 连续 14 个月为负增长,工业生产形势不容乐观。

产能过剩不仅存在于传统产业,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75.9%、72.4%、72%、79.9%,不仅如此,与传统制造业相比,新兴产业产能过剩更为严重,风电设备产能利用率为 59%,光伏制造为 50%、多晶硅为 44%。产能过剩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瓶颈。在“去产能”和“去存货”的双重压力下,企业找不到新的投资增长点,影响了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另外,中国未来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也是调结构的重要内容。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要依赖技术和产业持续的升级换代。

从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来看,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人均收入的提高有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反观过去 30 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非常明显,即使在贸易领域,出口产品的构成和技术复杂程度也在持续上升中。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德里克(Rodrik)教授在 2006 年的一项研究就曾发现,中国出口品的构成几乎与法国一样,从出口品的技术复

杂性来推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应该比现在高出 3 倍才对。的确,与中国出口产品种类相似的那些国家,其人均 GDP 水平都大大高于中国。

此外,中国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也是调结构的重要范畴。众所周知,所有成功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它的经济增长重心从传统农业部门转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过程中,劳动力也就随之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个结构变化的过程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国也不例外。在过去 30 年里,制造业和服务业吸纳的劳动力比重大幅度上升,农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下降了 30%,平均每年下降 1 个百分点。现在,农业的附加值占 GDP 比重大约 10%左右,未来还将会缓慢下降,有研究估计,到 2030 年会下降到 5%—7%,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与此同时,众多经济学家也纷纷表示,中国经济应该寻求调结构。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种种迹象表明,政府的态度是,在未来的发展中宁可牺牲速度,也要把经济结构调整好,以促进经济的长远发展。”经济增长越快,其结构就越容易扭曲,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的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就必须把经济增速降下来。

申银万国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表示,当前经济的问题、金融的问题更多是结构性问题,总体政策仍以稳为主,问题更倾向于通过定向制导的结构政策去解决。在没有突破底线之前,政策全面放松的可能性不大。他预计,在 GDP 增速上,将由数字转向数字背后的东西,在调结构的政策主导下,6.9%-7%的增速将被视作可接受的速度;而在 M2 增速上,相对于 7%的 GDP 增速,M2 增速将保持在 13%左右。



链接

从楼市看中国经济

“国五条”落地三月 楼市仍高烧不退

6 月 18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5 月 70 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5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价格同比上涨的有 69 个,其中涨幅最高的广州为 15.5%,唯一出现同比下降的为温州,其降幅为 3.8%。

一线城市的涨幅尤为明显。统计数据显示,新建商品房价格指数中,广州同比涨幅 15.5%,北京同比涨幅 15.2%,深圳同比涨幅 14%,上海同比涨幅 12.2%。二手房指数中,同比涨幅最快的也是一线城市,北京同比涨幅 12.8%,广州同比涨幅 9.9%,上海涨幅 9.2%,深圳涨幅 8.3%。

房价的快速上涨,总是超乎人们的预期。为了遏制这种局面,各地政府拟出台“限价令”。从目前全国楼市看,一、二线城市因为集聚了过多的资源,使得房价易涨难跌。有分析认为,在房价上涨预期未变的背景下,以行政手段限制房价,短期来看的确能够稳定价格,但从长期来看,难以扭转上涨势头。

继出台“国五条”执行细则后,北京出台了新的限价方案,即对报价明显高于项目前期成交价,期间不断被刷先进,形成梯度。”

格和周边在售项目价格,且不接受指导的商品房项目,可暂不核发预售许可证书或暂不办理现房销售备案。

据悉,北京价格规定最严,要求新房实际成交价格不得高于第一期和周边区域楼盘价格,与此同时,现房也需接受价格指导。有专家认为,其他地方将会效仿北京出台更严格的监管措施,以引导市场预期。据了解,继北京高调宣布“限价”之后,上海、广州、深圳亦对房价进行管制。比如广州要求,从 4 月 24 日起,全面执行商品住宅预(销)售价格网上申报制度,其预售价格需要接市国土房管部门的价格指导等。

除此之外,在房价连涨的背景下,广大的二三线城市也将步入价格干预的行列之中,日前,安徽、河南等地也将在 7 月 1 日起要求限价。

长期以来,楼市调控政策以所谓“合理房价”为目标,以政策引导售许可证书或暂不办理现房销售备案。

“房地产调控应该主动变局

而不是说继续进行加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马光远说,我们以前规划中的房产税、房地产信息联网,包括相应的一些税收政策等等,应该提上日程。如果说在目前情况下仍然寄希望于行政调控,甚至限价,限购等等,那么不仅无助于房地产市场的降温,反而是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要从过去以抑制需求为主,改变为增加供给为主,鼓励增加城市的保障房供给,增加普通商品住宅供给,增加住房土地的供给,控制地价、房价,从而激活房地产投资与销售,继续发挥房地产对经济发展的正能量。”有专业人士分析认为。

未来的整个调控思路应该更加注重制度的建设,应该更加注重从一个调控的思路转向制度建设的思路。

同时,调控土地价格也尤为重要。北京中原地产研究部总监张大伟分析称,目前整体土地市场温度依然处于攀升过程中,广州、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均出现了区域土地价格新高。整体楼市在国五条落地力度低于预期的情况下,购房者、开发商对市场的判断再次出现明显的一致看涨现象。

资金错配和空转 成中国经济 发展的“毒瘤”

■ 何青/文

进入 6 月份以来,中国银行间拆借市场利率屡创新高,6 月 20 日资金市场一度呈现出“失控”的局面,盘中最高成交利率达到了 30%,相当于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六倍。“钱荒”潮席卷了整个资金市场,资金面的持续紧张,也造成了股票市场连续几日的大幅下跌。作为全球货币最大发行国的中国,竟然面临“钱荒”,“钱荒”背后的问题耐人寻味。这场由银行“钱荒”引发的金融市场洗牌,似乎远没有结束。市场真的“很差钱”吗? 答案是否定的。众所周知,自我国市场化改革以来,广义货币供给 M2 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态势,截至 5 月末,我国 M2 余额 104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8%。特别是 2008 年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货币供应总量以每年超过十万亿元的规模迅猛增长。2008 年末我国的 M2 货币存量不到 50 万亿元,而截至 2013 年 4 月已经超过了百万亿元,接近了全球货币供应总量的 1/4,而新增货币供应量占到了全球的 50%。

然而,实体经济的表现并不乐观,增长速度逐年下滑,远远落后于 M2 的增长速度。这一现象说明了大量的资金并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或者是进入了产能过剩行业,导致了资金的错配和低效率使用。本来按照我国的经济方针,2007 年已经开始着力调整经济结构、抑制产能过剩行业。然而 2008 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打乱了原有的经济改革步骤,使得稳增长和保就业成为短期的经济目标。

在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下,我国在金融危机下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然而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经济失衡的程度。很多过剩行业,由于见效快,在金融危机后不仅没有萎缩,生产规模反而进一步扩大。

而很多代表新兴生产力的行业,却由于投资周期长、见效慢,和众多的中小企业一样,很难得到资金的青睐,出现了融资难的问题。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中国出现了,政府的货币政策越宽松,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的融资似乎越难。

更令人担忧的是,M2 的持续快速增长造成了长期以来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对资金流动性宽松的预期。大量的银行、信托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纷纷采取借短期投资长期和杠杆投资的策略,投资房地产、地方债、民间借贷等,来赚取超额利润。金融创新和表外业务的发展也为银行参与这一类高风险投资创造了便利。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在宽松流动性预期下,银行的理财产品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成为银行利润的重要来源。理财产品募集了投资者的大量资金,但投资去向难以监管,风险难以控制。为了满足理财产品的收益,甚至可能出现发行新理财产品,满足到期理财产品资金需求的现象,只要安排好到期资金计划,通过循环的交易,就可以赚取高额利润。但由于理财产品属于表外业务,并不纳入表内业务核算,表面上看银行的资金充裕,经营稳健,但一旦出现流动性问题,理财产品的违约或亏损就会直接侵蚀银行的利润,造成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困难。

这些资金的错配和空转,犹如中国经济发展的“毒瘤”,资金流动性的泛滥催长了这一“毒瘤”,经济增长的质量却没有得到明显地改善。而一旦“毒瘤”恶化,必然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美国经济的复苏和资金流出新兴市场国家,成为此次“钱荒”的导火索。资金的外流、外汇占款的减少,导致了资金市场流动性的减少。长期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商业银行已经习惯于央行在资金紧缺时会进行援助。然而,央行对 6 月 20 日资金市场的失控局面异常淡定,不仅没有增加流动性,反而继续发行 20 亿央票,继续收紧流动性,加剧了资金市场的“钱荒”。从央行的这一行为,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意识到了高额的货币存量、资金的错配以及货币空转的严重性和问题。如果央行采取紧急救援措施,无异于鼓励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继续从事这些高风险的投资,而新兴产业和实体经济仍然面临“钱荒”的局面,经济结构的调整也难有起色,经济的长期增长动力也会遭到削弱。

这一次的“钱荒”,正好为中国金融市场改革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通过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整,改变金融市场货币宽松的预期,逐渐刺破中国经济发展的“毒瘤”,去杠杆化,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金融市场,优化资金配置,引导资金逐渐流向新兴产业和其他实体经济行业。改革是痛苦的,但不改革未来更痛苦。这一次的“钱荒”虽然造成了金融市场的阵痛,但只要不伤害到实体经济,从长期来看将利于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使其服务于实体经济。

